

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

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

上冊
中文論文集

郝延平 主編
魏秀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特刊(5)

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

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

上冊
中文論文集

郝延平 主編
魏秀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特刊(5)

K25
J0103
1

序

劉廣京教授(1921—)，中央研究院院士，任教哈佛、耶魯、加州(戴維斯)、國立台灣等大學多年，桃李滿天下，著作等身，為國際中國近代史學界泰斗。本書為劉教授的友人和學生為他七十五歲祝壽而撰寫的論文結集，計四十七篇，分中、英文兩冊出版。劉先生在加州大學退休之年，曾有十位朋友撰文，為他出一本紀念集(Richard J. Smith and D. W. Y. Kwok eds., *Cosmology, Ontology, and Human Efficacy: Essays in Chinese Though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而本書中的個案研究，則範圍更廣，先討論晚明以降中國傳統的面面觀，再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漸變與暗變，乃至二十世紀初葉的蛻變。本論文集重新檢視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並提出了一系列截至民初為止有關自強、變法、革命運動的廣度與深度之問題，指出了未來研究的方向。

書中個別論文涉及範圍雖廣，但全書甚盼能以中國近世的傳統與蛻變為解釋中國近代史的焦點。早在徵文時，我們就請作者環繞此一主題，來討論中國近世四百年間的持續與推移，乃至極少有的斷裂。此外，本書有數點特色。第一、關於時代範圍，一般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多從鴉片戰爭開始，而且特別注重二十世紀的發展；本書則將中國近代史上溯至晚明的十六世紀，符合劉先生的主張。第二、本書頗具國際性。書中有不少論文對中西歷史的某一方面做了比較研究，而且作者來自世界各地；因此本書對當前國際中國近代史研究現狀，有相當的代表性。第三、作者從不同的觀點來討論中國近世史——有中國本位論，有「近代化」論，有屬於韋柏(Max Weber)學派，也有以馬克斯主義為基調，故全書可視為「百家爭鳴」的多元史學。第四、大陸學者的論文，除了學術貢獻之外，可以從中窺見大陸學界解釋中國近代史的新動向，所以也具有史學史的價值。

我們編輯的原則，是以學術性為重點與標準。因此，寄來論文之中的

三篇，未便收入書中，謹對作者致歉。也因為這個原則，我們將劉先生的近照放在論文集之後；緊接著則有論劉先生學術貢獻一文，精簡扼要，值得細讀。近史所前所長呂實強先生的後序，有回憶、有訪談、有闡發，詳述劉先生對近史所的過從。附錄三篇，提供關於劉先生生平、治學、及著述的一些資料。我們對本文集所有的作者，謹致最大的謝意。

如果沒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美國田納西大學歷史系的鼎力支持，本論文集不可能如此迅速出版。在編輯期間，劉先生曾閱讀全部英文論文，並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劉夫人 Edith Warren Liu，憑藉她專業的經驗，編訂潤飾英文，我們謹致謝忱。Pamela K. Crossley 教授協助解決有關滿文的問題，陸慶熊先生為本書封面題字，林文景先生幫助電腦磁片之轉換，均功不可沒。在一般編校方面之協助者，有杜賓漢、李慧玲、張秋雯、龐桂芬、Linda Gail Frost、Kim R. Harrison、Melinda L. Lee 等女士，我們在此一併敬表謝意。編輯委員會於 1995 年 12 月底發出徵文信，應徵者共六十五位。雖然後來有些人因故未能及時完成論文，但是我們仍然感謝他們的心意。

全書論文，多由作者之電腦磁片轉換而直接排印，所以論文格式體例，只希望每篇能自成一體。作者散佈世界各地，連絡不易；編者一在台灣，一在美國，協調亦不便；在台灣同時以中、英文出書，有某種程度的困難；最後，因會計年度時間所限，出書倉促。因此，一定有不少錯誤，敬請讀者指正。

編者謹識

1998 年 5 月

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

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

目 錄

上冊：中文論文集

| | |
|-------|---|
| 編 者 序 | i |
|-------|---|

傳統的面面觀

| | | |
|-------------|--------------------------|-----|
| 余英時 | 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 | 3 |
| 周啟榮 | 從坊刻「四書」講章論明末考證學 | 53 |
| 王汎森 | 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 | 69 |
| 李孝悌 | 明清的統治階層與宗教：正統與異端之辨 | 83 |
| 張壽安 | 孫星衍原性說及其在清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 103 |
| 熊秉真 | 中國近世兒童論述的浮現 | 139 |
| 陳捷先 | 蒙藏喇嘛對清朝建立的貢獻 | 171 |
| 魏秀梅 | 清乾隆五十一年懲官事例研究 | 179 |
| 徐新吾 | 關於麻絲棉大紡車及三錠棉紡車的歷史過程與議論 | 213 |
| 巫仁恕 | 明清城市「民變」的集體行動模式及其影響 | 229 |
| 劉翠溶 | 清代老年人口與養老制度初探 | 259 |
| 王業健、黃翔瑜、謝美娥 | 十八世紀中國糧食作物的分布 | 283 |

漸變與暗變

| | | |
|-----|----------------------|-----|
| 何漢威 | 《李星沅日記》中所見道光朝後期的政治社會 | 311 |
| 李恩涵 | 左宗棠在浙、閩、粵戡定太平軍的主要戰役 | 343 |
| 陳 絳 | 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難題 | 365 |

| | | |
|-----|-------------------------------|-----|
| 王家儉 | 英國對於清季創設現代海軍的影響——近代中國軍事之傳統與蛻變 | 375 |
| 潘光哲 | 王錫祺 (1855-1913) 傳 | 395 |
| 黎志剛 | 香山商人的冒險傳統 | 427 |
| 李國祁 | 張之洞與中體西用論 | 453 |
| 陸寶千 | 馬浮之春秋學 | 493 |

蛻變

| | | |
|-----|--|-----|
| 張玉法 | 晚清的山東新政 (1860-1911) | 517 |
| 王爾敏 | 近代中國之開明專制論與強人領袖之想望 | 567 |
| 王樹槐 | 上海華商電氣公司的發展, 1904-1937 | 581 |
| 陳慈玉 | 撫順煤礦工人, 1907-1931 | 605 |
| 閻小波 | 論孫中山先生的輿論意識 | 629 |
| 章開沅 | 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動員——以“排滿”宣傳為實例 | 649 |
| 陳明鈺 | 民初香港華人愛國行動初探——1912-13年「抵制電車」及1919年「五四抗議」 | 661 |

下冊：英文論文集

Aspects of Tradition

| | |
|---|-----|
| The Statecraft Thinker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in World History | |
| Alexander Woodside | 681 |
| Keystones of Neo-Confucian Orthodoxy | |
| John B. Henderson | 705 |
|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Handbooks of Village Community Rituals in Late Ming Guangdong | |
| Wing-kai To | 725 |
| The Nature of a Confucian Discourse on Orthodox Learning: Chen Jian's (1497-1567) <i>General Critique of the Obscuration of Learning (Xuebu tongbian)</i> | |

| | |
|---|------|
| On-cho Ng | 763 |
| Pursuing Sagehood Without Boundaries: The T'ai-chou School's Message and Lo Ju-fang'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1515-1553 | |
| Yu-Yin Cheng | 799 |
| Manchu Strategies of Subversion in the Conquest of China | |
| William Schultz and Chen-main Wang | 843 |
| Hidden Change and Metamorphosis | |
| "Very Unhandsome Chops": The Canton System Closes In, 1740-1771 | |
| John E. Wills, Jr. | 873 |
| Uncertaint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A Case Study of Manhop's Failure, 1828 | |
| Kuo-tung Ch'en | 889 |
| The Theologian as Revolutionary: Hung Hsiu-ch'üan's Religious Vision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 |
| P. Richard Bohr | 907 |
| China's Nineteenth-Century Military Industrialization: Achievements and Consequences | |
| Thomas L. Kennedy | 955 |
| China's Defen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venue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75-1879 | |
| David Pong | 979 |
| Self-strengthening and Manchu-Han Relations | |
| Edward J. M. Rhoads | 1007 |
| Western Missionary Views of Educated Chinese Wome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
| Susan Mann | 1039 |
| Economic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1860-1895: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 |
| Man-houng Lin | 1067 |

The Rise of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Late Qing: Elite Opinion and Official Policy

Zhongping Chen 1091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ina's Three Commercial Revolutions

Yen-p'ing Hao 1117

A Village Church in Jiangxi: Christianity in One Rural Locale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lan Richard Sweeten 1155

The Teachings of Ritual and the Rectification of Customs: Echoes of Tradition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China

Richard J. Smith 1173

History and Legend: *Yung-cheng Chien-hsia* Novels

Silas H. L. Wu 1217

China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

Philip A. Kuhn 1261

劉廣京先生近照

Kwang-Ching Liu: In Appreciation

Stephen R. MacKinnon, Kai-Wing Chow, and Chi-Kong Lai 1275

後序：劉廣京先生與近代史研究所（呂實強） 1285

附錄一 學人專訪：劉廣京院士（蘇雲峰） 1309

附錄二 再訪劉廣京先生（黎志剛） 1321

附錄三 劉廣京先生履歷及著作表 1333

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

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觀

傳統的面面觀

引論

自十五、六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開始了一個多顯烈的變動歷程。由於變動是在日積月累中逐步演化進來的，當時身在其中的人往往習而不察。後世史家也不免有 hindsight，尤其晚、清易代之際以後，這一內在的轉變和西方文化入侵所激起的劇變匯合了，於是因此也掩沒在後者的洪濤之中。黃不疑引顧明代的沈嘉，李鴻章說：「嘉平以後，中國面臨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固然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事實，但是我們如果真想到這一個半世紀的中國「變局」有深入內涵的理解，那麼明清時期的內在轉變必須儘早提到史學研究的日程上來。談到這裏，這一內在轉變雖然近代的劇變所掩，卻並未消逝。相區別，在李鴻章所說的「變局」開始發展的早期，它就在暗中發生了轉向的作動。談到這裏，正式中國的「變局」決不能看作是晚、清西方入侵所激發而成的。我們應該更應該注意中國在面對西方時所表現的主動性。從思想史上看，明清之際出現了一批求學求道的儒學知識分子，他們在西方的價值和觀念方面作出了明確的選擇。但這並不代表不是後來的：所謂儒學的轉向者在更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選擇。這是明、清以來中國的內在轉變在近代激發有爆發力的關鍵。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0, No. 1, 1976. The Chinese and Oriental Pages.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P. R. China, 1976. Pp. 1-100. Price: 1.00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en, Yuan-she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75)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Hong Kong, 1975. Pp. 1-110. Price: 1.00

Chen, Yuan-she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75)

對 面 面 的 蘇 聯

Chen, Yuan-she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75)

Richard J. Smith,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75)

History and Legend: *Jing-sheng Chen-kuo Novels* (1975)

Siler H. Y. Wu, *History and Legend: Jing-sheng Chen-kuo Novels* (1975)

Chen as a School for Hongkong (1975)

Philip A. Kuhn, *Chen as a School for Hongkong* (1975)

張其成先生近著

Xiang-Chang Liu: In Appreciation

Stephen R. MacKinnon, Kin-Wing Chow, and Chi-Rong Lai (1975)

沈從文與京先生現代史研究所 (呂實強)

附錄一：學人專訪：劉鳳琪女士 (薛雲峰)

附錄二：專訪劉鳳琪先生 (黎樹培)

附錄三：劉鳳琪先生遺稿及著作輯

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

—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

余英時*

引言

自十五、六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開始了一個長期的變動歷程。由於變動是在日積月累中逐步深化起來的，當時身在其中的人往往習而不察，後世史家也不免視若無睹。尤其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一內在的漸變和西方文化入侵所激起的劇變匯合了，前者因此也淹沒在後者的洪流之中，更不易引起現代人的注意。李鴻章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自然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但是我們如果真想對這一個半世紀的中國「變局」有深入的歷史理解，那麼明清時期的內在漸變便必須儘早提到史學研究的日程上來。據我所見，這一內在漸變雖為近代的劇變所掩，卻並未消逝。相反地，在李鴻章所說的「變局」開始展現的早期，它曾在暗中發生了導向的作用。換句話說，近代中國的「變局」決不能看作是完全由西方入侵所單獨造成的，我們毋寧更應該注意中國在面對西方時所表現的主動性。從思想史上看，清末民初出現了一批求變求新的儒家知識分子，他們在西方的價值和觀念方面作出了明確的選擇。但這些選擇並不是任意性的；明清儒學的新動向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選擇。這是明清以來中國的內在漸變在近代繼續發揮影響力的顯證。

*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從明清的內在漸變與近代的「變局」之間的關係著眼，歷史向我們提出了「通古今之變」的新要求。在這一要求之下，我們必須重新挖掘十六世紀以下的社會史和思想史。現代史學家在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少，但大體言之，在概念上有兩個主要傾向：一是把明清史看作中國傳統或帝國時代（“traditional” or “imperial” age）的最後階段，因此與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近代」不相連貫；中國的歷史傳統由於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斷裂了。另一傾向則是將明清的社會變遷套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公式之中，因此而產生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但是根據此說，「萌芽」始終未能「成長」，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最後還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明清的一點點「萌芽」到了近代便像一股細水流入江河一樣，沒有多大的作用可言了。

這裏毋須對以上兩種歷史觀點作任何評論；而且我們也必須承認：在這兩種觀點指導下的明清史研究至少有發掘了大量史料和提出了許多新問題的功績。但是由於在概念上過分強調了「傳統」與「近代」之間的斷裂，一般地說，這些研究還不足以充分承擔「通古今之變」的史學任務。所以我們今天有必要去開闢新的視野，重新檢討明清社會史與政治史，並追尋明清漸變與現代劇變之間的內在關聯。在〈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中，我的注意力側重在儒家如何開拓民間社會的一方面；在歷史背景的方面，我則特別強調明代專制皇權的惡化怎樣促成了儒家的異化。本文擬更進一層，從社會變動的背景著眼，觀察儒家價值意識和思想的轉向。所以這兩篇研究所涉及的範圍和史料雖然完全不同，但基本旨趣則是一致的。⁽¹⁾

(1) 「資本主義萌芽」說不但是硬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公式，而且是直接為毛澤東的話作注釋。毛在一九三九年所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中國的封建社會繼續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這個社會的內部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封建社會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見《毛澤東選集》，北京：1969，第二卷，頁589）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史學家關於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都是為了要證明毛的這一段話是正確的。「萌芽說」在今天大陸史學界仍然流行，但其說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國外早在五十年代便已有駁論。參看 Albert Feuerwerker,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958). 毛並不是史學家，他的說法最初也是從左派史學界拾來的。但一九四九年以後，這一說法已取得“欽定”的地位，正如清代康、雍、乾三帝的“欽定程、朱”一樣，它已不再是

十五、十六世紀儒學的移形轉步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歷史現象。大體言之，這是儒學的內在動力和社會、政治的變動交互影響的結果。以外緣的影響而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棄儒就賈」的社會運動和專制皇權惡化所造成的政治僵局。這二者又是互相聯繫的：前者以財富開拓了民間社會，因而為儒家的社會活動創造了新的條件；後者則杜塞了儒家欲憑藉朝廷以改革政治的舊途徑。這兩種力量，一迎一拒，儒學的轉向遂成定局。以下試就新獲史料提出幾點具體的論證。讀者儻取與《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與〈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一併讀之，則更可瞭解本文的宗旨所在。

一、科舉名額與「棄儒就賈」

「棄儒就賈」作為一個普遍性的社會運動首先與人口的成長有關。我在《商人精神》一書中曾指出，明代科舉名額——包括貢生、舉人和進士——並未與人口相應而增加，士人獲得功名的機會於是越來越小。⁽²⁾十六世紀時已流行著一種說法：

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³⁾

這當然不是精確的數據，但它在社會心理上所產生的衝擊力則甚大，足以激動不少士人放棄舉業，獻身商業。據人口史研究的大略估計，十四世紀末中國人口約為六千五百萬，至一六〇〇年時則已在一億五千萬左右，增長了一倍多。⁽⁴⁾所以我們可以假設「棄儒就賈」與科舉名額的限制有關。但是

一個普通的史學假說了。拙著〈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原刊於《中國文化》第十一期（1995年7月），現已收入《現代儒學論》（River Edge, NJ: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2) 拙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1987），頁117。這三項名額雖時有增減，但變動的幅度不大，與人口增加不成比例。見《明史》（中華書局標點本）冊六，頁1681及1697。

(3) 《豐南志》第五冊〈百歲翁狀〉，引自張海鵬、王廷元主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合肥：黃山書社，1985），頁251。

(4) 見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64.

如果要進一步證實這一假設，我們還必須找到直接的證據，進一步證明科舉名額確已應付不了士人數量的不斷增長。因為這既是一個嚴重的政治、社會問題，當時的人似不可能完全視若無睹。最近遍檢十六世紀有關文集，果然發現了下面兩條重要的材料。

文徵明(1470-1559)〈三學上陸冢宰書〉云：

開國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略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眾，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材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眾多，寬額舉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沈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⁵⁾

陸冢宰是陸完，據《明史·七卿年表二》，他任吏部尚書在正德十年至十五年(1515-20)。又據開頭幾句賀語，知此書作於陸完初接任時，即一五一五年。文徵明所討論的是蘇州地區的生員名額和貢、舉兩途三年總數之間的比例。以一千五百名生員，三年之間祇有五十人可以成為貢生或舉人，則每一生員在三年之中祇有三分之一的成功率。可見「士而成也十之一」估計是太保守了。此書中有兩點應該特別解釋一下。第一、「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這句話最能說明士的人口激增。《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一〉云：

生員雖定數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1425-34)中定

⁽⁵⁾ 見《甫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卷二五，頁4-5。

增廣之額。……增廣既多，於是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⁶⁾

現在蘇州地區的生員，附學者已比廩、增兩項正額多出了好幾倍，足見士的人口增加之速。這也間接地反映了明代人口總額的大幅度上升。至於尚未成生員的士人，其數量自然更大得驚人，不過我們已無從估計了。第二、文徵明在此書中所要求的是增加貢生的名額。書中又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竟格不行」之語，則當時朝廷上主張增貢額的大有其人，並不是文徵明一個人的主張。

與文徵明同時的韓邦奇(1479-1556)也關心貢生長期沉滯、老死牖下的問題。他指出縣令是最重要的治民官，而明代縣令則分出於進士與舉貢二途。前者因少年往往得志，為前途計，初出治民較能盡心；後者則垂老始得一官，「日暮途遠，必為私家之計。」為了老百姓著想，他主張大增舉人、進士的名額，以解決舉貢一途的過度壅塞。因此他說：

歲貢雖二十補廩，五十方得貢出，六十以上方得選官，前程能有幾何？不有以變通之，如天下斯民何！莫若多取進士，每科千名，鄉試量其地方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無偏無黨，而治可成矣。⁽⁷⁾

可見他和文徵明所關注的同是當時科舉制度已無法容納士的人口激增的問題，不過他的解決方案與文徵明不同而已。根據這兩條史料，人口倍增與「棄儒就賈」之間的因果關聯便完全成立了。⁽⁸⁾

(6) 《明史》標點本，冊六，頁1686-7。

(7) 韓邦奇，《苑洛集》（四庫影印本）卷一九〈見聞考隨錄〉二，頁5。

(8) 據《明史·選舉志一》嘉靖十年(1531)和萬曆張居正當國時期(1573-82)，朝廷兩度下令「沙汰」或「核減」生員（第六冊，頁1687）。這也反映了士人數量快速成長的事實。人口成長是一長期過程，大約自十五世紀中葉以後便在生員名額的不斷擴大中顯示了出來。「增廣生員」，尤其是「附學生員」的倍增最可注意。徐樹丕（卒於1683）《識小錄》（涵芬樓秘笈第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卷二〈沙汰生員〉條說明末生員「進者愈多，退者愈少。販夫俗子，皆列章縫」（頁15），足見其中商人子弟之多。

「棄儒就賈」蔚成風氣以後，商人的隊伍自然隨之擴大了。限於史料，我們不可能對商人人口的增漲提出任何數據，甚至約略的估計也無從著手。從有關文獻出現的時代推斷，我們大致可以說，「棄儒就賈」在十六、十七世紀表現得最為活躍，商人的人數也許在這個時期曾大量的上升。提及晚明的商人，我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徽商，其次則是山西商人。此外江蘇洞庭的商人也很有名，當時已有「鑽天洞庭遍地徽」的諺語。⁽⁹⁾其實十六世紀時商人在中國各地都顯出蓬勃的活力，張瀚(1511-93)的〈商賈記〉便是明證。⁽¹⁰⁾由於商人的社會活動在當時特別引人注目，故晚明小說中往往以商人為故事的主角，不但久已行世的《三言》、《二拍》如此，而且最近重新發現的《型世言》也是如此。⁽¹¹⁾這也可以看作是商人數量在此期內激增的一個折影。

「棄儒就賈」為儒學轉向社會提供了一條重要渠道，其關鍵即在士和商的界線從此變得模糊了。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參加了商人的行列，另一方面則是商人通過財富也可以跑進儒生的陣營。關於前一方面我們已認識得很清楚，不必再說。關於後一方面，我們所知較少，不妨略作補充。《型世

(9) 此諺語見《今古奇聞》卷二，轉引自薛宗正，〈明代徽商及商業經營〉，收在《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76。關於這三地商人的研究，論著甚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連載於《東洋學報》第三十六卷第一至第四號(1953-54)（中譯本見《徽商研究論文集》，頁131-272，有作者一九八三年的〈中譯本序言〉）；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的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72）；傅衣凌，〈明代江蘇洞庭商人〉，收在他的《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 見《松窗夢語》卷四（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5），頁80-7。關於〈商賈記〉的研究，可看 Timothy Brook, "The Merchant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XXIV, Part II(1981), pp.165-214.

(11) 《型世言》共四十回，編者為陸人龍，初刊大概在1631-32。此書在中國久已失傳，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藏有孤本。法國科學研究中心陳慶浩先生在一九八七年發現了此本，並於一九九二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影印問世，共三冊。詳見陳慶浩為該書所撰〈導言〉。關於小說中的晚明商人，可看黃仁宇，〈從《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七卷第一期（1974年12月），頁133-53。《型世言》中的商人故事，見第五、六、二十六諸回。按第六回寫徽商逼娶唐貴梅事是真實故事，出自楊慎〈孝烈婦唐貴梅傳〉，李詒，《戒庵老人漫筆》卷四〈唐孝烈婦〉條首節錄楊文。又第五、七、十二諸回也都有明代本事，斑斑可考。

言》第二十三回有一段話，寫得很生動：

一個秀才與貢生何等煩難？不料銀子作禍，一竅不通，纔丟去鋤頭匾挑，有了一百三十兩，便衣冠拜客，就是生員；身子還在那廂經商，有了六百，門前便高釘貢元扁額，扯上兩面大旗。⁽¹²⁾

小說家諷世之言，自不足據為典要。但當時確有類似的現象，故說故事的人才能順手拈來，涉筆成趣。（例證見後文）我們不難想像，在十六、十七世紀之際，文徵明所說的超出生員正額數倍的「附學生員」之中，已有商人子弟用一百三十兩買得的，甚至他所重視的「貢生」也已有商人用六百兩銀子從地方官手上活動得來的。《型世言》的描寫雖誇張却不背史實，點出了當時商人進入士階層的一條最常用的途徑。在明、清文集中我們常常讀到商人背景的「太學生」或「國子生」的墓志銘。這便是因為貢生例入太學——國子監——為監生的緣故。下面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韓邦奇〈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云：

西河子諱瓘字汝完，姓趙氏，別號西河。……關內馮翊之朝邑、大慶關人也。未弱冠，入為縣附學生，以朱子詩屢應秋試，補廩膳。甫五年朝廷用輔臣議，令天下郡縣選懷才抱德之士充歲貢。西河子應例上春官，遊國學，歷部事。天官考勤，籍入仕版，選期已屆，而西河子死矣。……西河子之鄉，萬餘家皆習商賈，苦艱于息不益。西河子笑曰：何若是之艱哉！……世有無用之儒者哉！不數年起家數千金，而人莫窺其所自也。⁽¹³⁾

韓邦奇是這位西河子的業師，〈墓表〉未提及其先世，可證趙瓘原和其鄉人

(12) 《型世言》中冊，頁1027。按：「衣」下一字洶漫不清，姑暫定為「冠」字，但與文義無妨。

(13) 《苑洛集》卷七，頁5-6。按：《明史》卷六九〈選舉一〉說：「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蔭監，捐貲曰例監。同一貢監也，有歲貢，有恩貢，有納貢。」（第六冊，頁1675-6）《型世言》所說的也許是指「捐貲曰例監」或「納貢」。這種用錢買來的監生在當時是受輕視的。例如復社領袖張溥（1602-41），因為同里的陸文聲「輸貲為監生」，便拒絕他入社的請求。見《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五·張溥傳〉，冊二四，頁7404。